

# 鲍十：我推崇不像小说的小说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


近日，作家出版社推出鲍十全新长篇小说《我是扮演者》。该作品以日记的形式，讲述了演员孟千夫的从业经历，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故事。在日记中，孟千夫对自己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思考，不论是帝王、灾民和饥民、知识分子、乡绅地主，还是士兵、下岗工人、小偷、杀人凶手、黑社会成员……把他扮演的角色串联起来，相当于一部别样的中国社会史。主人公深入且专注于自己的角色，他坚持把自己称作“扮演者”，直到生命结束。

《我是扮演者》的文本具有探索性，叙述富有张力，内容与结构均有一定的创新性，阅读时给人带来强烈的阅读感。

“写我想写的，写我能写的。不想写的东西我不去写！”鲍十经常这样说。小说创作一直是鲍十的“业余”工作，他的主业是文学期刊编辑。三年前，他退休了，“退休后有时间了，我就想认真地写那么几部作品”。

## 新作选择以演员、电影来贯穿历史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会选择演员这样的题材、写一个似乎“入戏太深”的演员？

鲍十：用一个演员演电影这种方式来结构我的小说，跟我要表达的主题是有关系的。文学介入生活、介入社会的角度有很多，可以用传统的方式，比如讲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，通过人物的命运来表达主题。但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，显然用这种方式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。在创作初期，我想把中国历史“兜”一下，通过对历史的扫描反思一些东西。所以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演话剧、唱歌的方式，最后采用了现在这个办法，用一个演员，他演了多部电影，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。

这个演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有自己的性格和思想。在写他的时候，不能完全按照作者的

意思来左右他。他爱读书，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成长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他成为这样一个演员：敏感、多思、有修养。作为体验派的演员他要去演，要投入，入戏很深，这也决定了他会受到外部环境、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影响和伤害。

羊城晚报：您的早期作品《纪念》曾被张艺谋执导改编为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此次选择电影作为创作素材，和第一次“触电”有关系吗？

鲍十：应该说也有关系，但不是直接的关系。可能因为我接触过电影，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种形式，但没有更深的关系了。

羊城晚报：您是想通过演员的悲剧来传递什么？

鲍十：客观来说是反思他所不适应的、不能接受的东西。实

际上小说有两大部分，一部分是写这个演员，一部分是通过他所演的电影来写历史。我最初的想法是通过他来写我要写的故事，但写一个人，他必须要有变化，他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套，你就得尊重他行动的逻辑。他在演的过程中，不断地受到伤害，他又不接受，纠结到最后就导致他的悲剧。

羊城晚报：书中演员孟千夫说：“把我扮演过的角色串联起来，差不多就是一部五花八门的中国历史。”其实您写这本书是否有这样的野心，把中国历史的真实样貌撕开给读者看？

鲍十：不能说是野心，只是有这个意识。小说的初衷就是把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事情，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，让读者思考。中国有五千年历史，如果不好好反思，那是很可惜的。



羊城晚报：距离您上一次写长篇小说已经有20年了，后来您可能更多写短篇，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又开始写长篇？

鲍十：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，退休之前我一直在做编辑，有十几年，我的创作实际上一直处于业余状态。每天一到单位有各种杂事，到家就累得不行，根本没有大块时间来写长一点的作品，只好写一些中短篇。一个短篇也得断断续续地写个十来天。所以这么多年没写长篇的原因主要是时间问题，也许这是一个借口。

羊城晚报：这一部小说您酝

酿了多久？

鲍十：最早是个中篇《扮演者手记》，2014年在《花城》杂志发表。后来我慢慢把它写成长篇。因为有好多文友看了之后都说好，说它“另类”，跟当下的小说有些不同。受到这些鼓励，我就想完善它，结果就写成了长篇。从中篇到现在成稿出版，这8年多时间我也没有办法用全部精力去写。

羊城晚报：编辑的身份能为您写小说提供什么新的视角或帮助？

鲍十：我还真想谈谈这个问题。从30岁来就做编辑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得看多少稿子？这种看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厌倦的过程，很多小说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故事，这样一些人物，充满雷同。通过阅读稿子，我对文学有了自己的判断。我后来非常厌恶那种拿腔作调，讲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，很多小说都是这个德性，充斥着所谓爱恨、决裂、伤

感等，大概逃不脱这些套路，思考的容量非常小。

后来，我就非常推崇那种不像小说的小说。越像小说实际上越没劲，它的情节确实非常完整，两个人相遇了，闹矛盾了，又和好了，又闹矛盾了，最后和好了，或者最后分开了；或者一个人一开始很潦倒，碰到谁就醒悟了，奋斗了，最后成功了，又失败了，戏剧性太强，充满套路。

我后来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小说，包括自己写作时，明明可以写那种读起来很带劲的情节，但我不想那样写，就把它打散一点，让它看起来不像小说。

羊城晚报：不像小说的小说是怎样的？

鲍十：它可能更多表现个人的感受、个人的体验、个人的很细微的那些东西，那种真挚和真诚。太强的戏剧性可能会把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压住了，或者舍弃了。

## “跨界”创作仍重在表达内心感受

羊城晚报：有人评论您这本小说带着先锋色彩。从写作题材上看，它跟以往相比有不同吧？

鲍十：我是农村出身的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高考之后才进了城。我对农村生活的印象非常深，这也影响到我的写作，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写乡土。后来也写了城市的生活，到了广州之后又写了一些关于广州的，这两年写了几篇关于海岛的小说。《我是扮演者》在我的写作中是个另类，我自己给它定义为一种跨界，突然写了个演员，写了一个文艺人士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跨界体验。

羊城晚报：小说框架有了之后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包括读一些历史书和回忆性的文章，读了好多。我必须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，让小说充实起来，让它真正成为一部作品。

羊城晚报：也有评论家认为您构想中的电影有“第四代”的痕迹。

鲍十：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我个人想得最多还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，包括对文学的理解，也包括对文学的责任。

征吗？

鲍十：我没想过。可能读者从我小说所写的那些电影，能感觉到“第四代”导演的风格，但我不是有意要贴近“第四代”，我所想的是我要表达的东西。

羊城晚报：以前跨界编剧的经验对您现在创作这部小说也会有帮助？

鲍十：客观上肯定是有帮助。在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之前我没写过电影剧本的，那么有了这部作品以后，我就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，起码知道了一些基本的东西。

羊城晚报：这次写“另类”的题材，您希望能达到怎样的突破？

鲍十：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我个人想得最多还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，包括对文学的理解，也包括对文学的责任。

## 好的小说给影视作品提供好的基础

羊城晚报：这跟小说创作有什么感受不一样的地方？

鲍十：策划就是大家互相碰撞，要综合大家的意见，不完全是自己的。这些不同的想法都是有益的，对我有所启发，思路更开了。

羊城晚报：那对小说创作会不会有您的这种启发？

鲍十：写小说是另一回事，写小说你就会把那些东西放到一边了，进入的是小说的语境。电影和文学差异还是很大的。简单来说，写小说我坐在这里可以想到老家东北，可以想到南极，但是电影不行，电影要面对一个画面，做不到那么自由。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小说家能

为编剧行业带来什么？

鲍十：真正意义上的好的小说家，其作品都是经过充分的发酵。他写一个东西，会在内心反复地酝酿，对细节非常较真，比如人物所处的环境、人物的性格，会非常认真对待。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很好，放到影视圈里边，会给影视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和方向。我个人认为一些好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，是对电影的贡献。

羊城晚报：您接下来在创作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计划？

鲍十：我目前就是写几篇别人约的中短篇稿子，这期间我也在写一部长篇。现在退休后有时间了，我就想认真地写那么几部作品。

# 人文周刊·七杯茶 A7

## 【有感于思】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### 新认识

我的小孙子枣枣，是个只有一岁7个月的幼儿。准确地说，正处在从婴儿到幼儿的过渡期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家长小心呵护，每一句话都需要长辈耐心教导。不过，近日的一件小事却让我对他的判断力、悟性、脑筋机敏程度产生了新的认识。

前几日，枣枣的奶奶从太原回来，送他三个玩具，都是他特别喜欢的“特种车”：大吊车、推土机、挖掘机。这些“车”几乎都是按真车的比例缩小的“模型”，很是可看。孩子喜欢极了，爱不释手。不过，因为要仿真，三个玩具都是用金属造的，而且推土机的“铁铲”带刺，吊车的“手臂”有明显突出的长度。玩具的外盒也标注：“适宜3岁以上儿童”。为了安全，家长把它们都收起来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一人陪伴他，不知怎么到了那几个玩具，他重复念叨玩具名称，表示出强烈的想要玩一玩的意愿。我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呀，他居然一路小跑，引领我进入书房，准确地指着冰箱上面的一个竹筐。果然，玩具都在里边。我们于是很愉快地一起“偷偷地”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收起来。

再一天上午，大家又都上班去了，还是只有我和他在家里。我忍不住又问他，要不要玩那些车呀？他肯定地点

头。

我很惊讶于这一发现。即使年长60岁，我们也不能处处自以为是。

【名著识小】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### 鸟鸡国故事源于城外？

不少学者都认为，鸟鸡国的故事(第三十六到三十九回)不是《西游记》的原装，而是另外插入的异域传说。我来概括一下，论据有四个方面：

(1)这一回的叙事，与前后故事都不太相似，情节也有些冲突。比如给鸟鸡国王做人工呼吸那段，说“惟行者从小修持，咬松嚼柏，吃桃果为生，是一口清气”，明显早于前回孙悟空空自述吃人生果相抵触。

(2)这个故事有可能由利玛窦等传教士从西方传来，同时也是《哈姆雷特》的源头，是东西方叙事同源异端的一个例证。

(3)“立帝货”可能是“立帝货”的讹抄，立帝货是Redimere的音译，即耶稣的专称。所谓“上知五百年，下知

## 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评论员、大学教授

物以情观，情以物兴，诗是一种对话的心灵媒介。

人们爱读诗，首先是因为诗歌很美，格律的美，词句的美，意境的美。中国的文学教授说，诗歌，是语言找到最完美的表达方式。柯勒律治也说过大致的意思：诗是最好的诗按照最好的次序排列而成。不过在我看来，相比这些形式之美，读诗的人更应该欣赏的是其价值感召之美，这种美，能给迷茫、焦虑、内卷、内耗的现代人一种救赎与治愈。诗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，更可以去内耗、反内卷。就像中文系教授杨

雨说的，读一首唐诗就仿佛是和一个好朋友对话，它可以疗愈心灵孤独，在每个人的心灵和世界之间搭建一座可供自在往来的桥梁。

现代人不能失去读诗这种对话方式。是啊，抖音上那些读诗的人，都是在对话，都是在历史的星空中寻找那个“等待自己的月光”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唐诗有心灵治愈的功效，首先在于，这些诗在写作时，多是诗人的自我疗愈过程。边关时的彷徨，艰难时的忧虑，失意时的迷茫，失恋时的痛苦，乡愁时的郁闷，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君言不得意，归卧南山陲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！这些怀疑、愁绪和内耗，在写成诗后，已经在

## 与根系价值对话

诗境中冰释了。写诗，是一种自我抒发和排解的方式，令人读古人疗愈之诗，自然也有疗愈的效果。

这种对话，也是与一种深深扎根于价值对话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不仅在于它是被人心、被时空和岁月筛选出来的，更在于，如一个作家所说，它蕴涵着人类典型的情感、典型的思想、典型的人性状态、典型的思维习惯，提供了一个从古至今的情感广度和思想深度。

——唐诗之为经典，正在于这种广度和深度。这种深度在口语相传中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滋养过我们的祖辈后，又在指尖、舌尖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被传唱，滋养着当下的人们。

## ●随手拍

下午的光

□图/文 刘运辉

十月已近下旬，走在上海的陕西北路上，温度在调和着光。路对面墙上，梧桐树影雕刻着时间，小黄车的车把梦想着飞翔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  
ycwbwyb@163.com

## 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### 芒果般的心

说，只不过是生活另一道小小的坎罢了。他们咬紧牙关告诉自己：“我们能跨过的，肯定能！”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态，形诸外，便变成了一种被生活戏弄而毫不在乎的潇洒。

这天，当我在一个小村落的集市向一名胖大妈购买芒果时，她指了指我的手机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来，拍我，拍我！”说着，左右两手各拿着一个硕大的芒果，径自扭腰摆臂、双足蹬地，忽左忽右、忽前忽后，动作利落地跳起了节奏感十足的非洲舞；其他摊贩，莫不拊掌大笑；笑声宛若霏霏细雨，纷纷渗入了大大小小的芒果里，芒果也因此溢出了丝丝缕缕的香气。

生活可以很苦，然而，心却必须像芒果。

## 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### 会讲故事的郭宝昌走了

10月11日

著名导演、编剧郭宝昌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3岁。观众最耳熟能详的郭宝昌的影视作品是《大宅门》。1983年，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任职的郭宝昌，就支持张艺谋和陈凯歌推出了《一个和八个》《黄土地》等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，因此他也是第五代导演的“伯乐”。

2021年第2期《收获》杂志，以《老岁月里的人大物》为题，刊载了郭宝昌的非虚构作品。郭宝昌自幼被卖进豪门，经历曲折，令人唏嘘，饱经人世间的沧桑，阅尽人生百态与世情风物，一生里见过众多的奇人异事。细读他的文章，便知道郭宝昌讲故事的天赋与他的写作能力是浑然天成的。一篇《王师父与狼三儿》，讲述了5岁那年就开始教他武术的王师父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：清末民初的时候是威震四海的镖师，武艺超群，各路镖都有他的踪迹，走遍天下无敌手，“可我眼前的王师父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糟老头儿……”但是一天夜里，大家从睡梦里惊

郭宝昌自己曾经感慨：“老天爷让我经历那么多事儿，认识那么多人物，又给了我讲故事的能力，这大概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老天爷给我的使命。”而他的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，就是他的“纪念碑”。

## 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我几次去日本关西，有时会跟京都哲学学派

西田几多郎(1870—1945)的第四代弟子森哲郎教授讨论一些问题。

森教授也是德国哲学的专家，他送给我的已发表作品中，有一些是他用德文写的关于谢林哲学的文章。但他更多的研究是有

关“十牛图”的，他也将一套日本的“十牛图”明信片送给我。在京都的日子，我们会吃几顿饭，一起畅谈畅饮。有一次在几杯清酒下肚之后，他说他不太看得起很多仅仅待在书斋中的学者：他们只看重发表的东西，这些人每年写太多无用的东西，但又常常因此沾沾自喜。

我明白他的话的意思，他的